2026年第36期新闻稿：全球南方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墨西哥城》，胡安·奥高曼（墨西哥）作于194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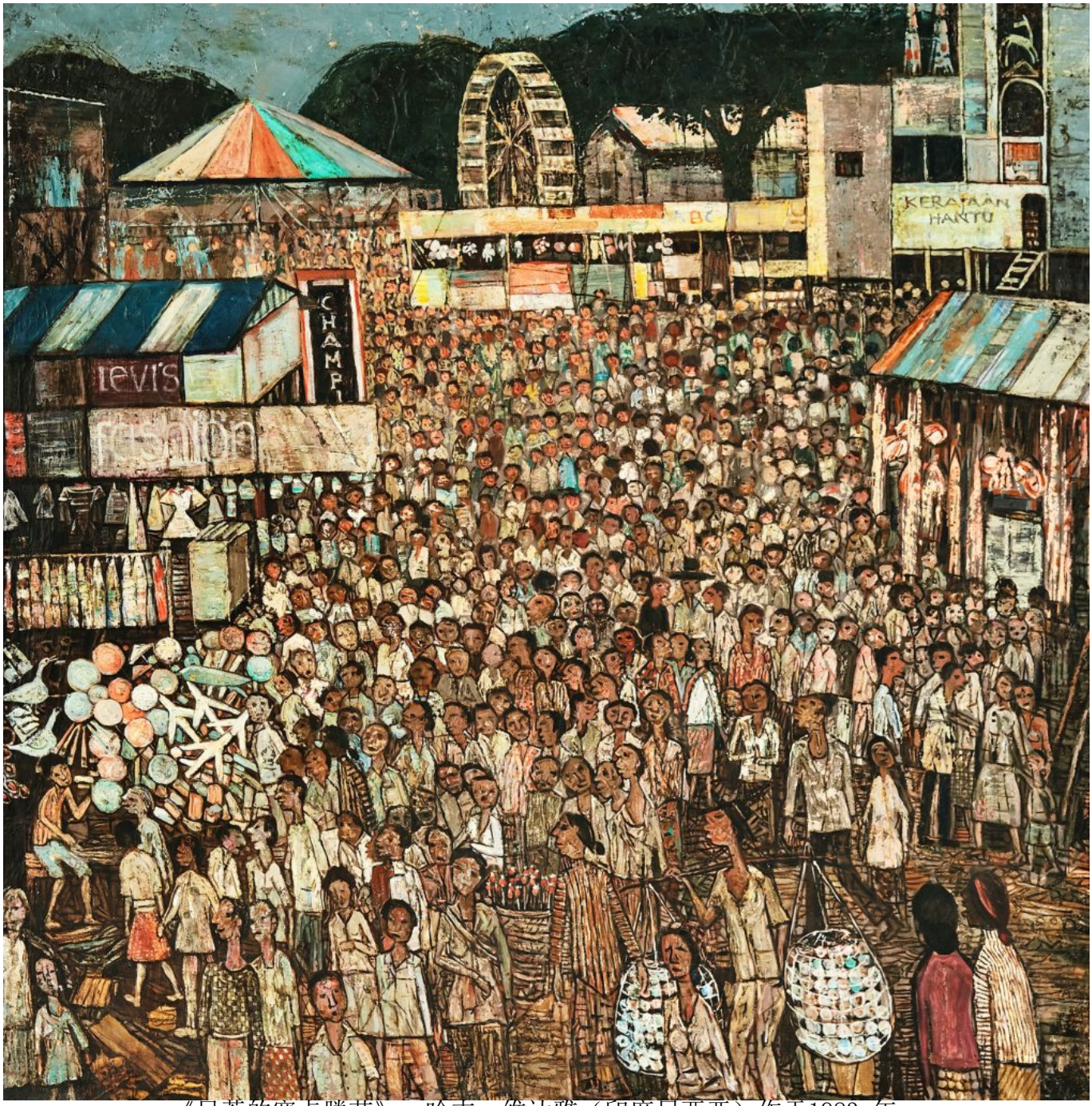
四十年来，全球南方国家一直被告知，经济计划是个错误。国家应当后退，关税应当降低，公共企业应当私有化，投资应当托付给那些以击键速度跨境调拨资金的人。发展将通过比较优势到来：每个国家都应当出售自己已有的东西，购买别人已经学会制造的东西。从哈拉雷到雅加达，结果都清晰可见。拥有丰富矿产、肥沃土地和年轻劳动力的国家仍然困在全球价值链中回报最低的一端，出口原材料，同时进口用这些原材料制成的高价值商品。例如，加纳出口可可，却进口巧克力；委内瑞拉出口原油，却进口精炼燃料。财富从全球南方流失，而债务、非正规就业和紧缩却在加深。

全球南方的进步派产业政策必须从拒绝这笔交易开始。“经济”不是一个中立或自然的事实，而是殖民干预、新殖民重构、财产制度以及获取技术和资本模式的历史产物。增长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谁控制生产过程，以及收益如何分配。发展的目标不应是增长本身，而是人类生活的繁盛。

《水》，查尔斯·希勒（美国）作于1945年。

曾经让产业政策成为全球南方禁忌的那些机构，如今已开始修正它们的处方。这样的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例如，经合组织现在**承认**，单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生产率低下、供应链脆弱以及绿色和数字转型问题，除非受到某种驱使，否则很少有企业会把资本冒险投入长期投资。世界银行进一步**认为**，只有国家主导的投资才能推动工业化，包括通过建设工业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电网以及提供长期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更为谨慎，**承认**补贴和贸易保护对幼稚产业的重要性，但警告不要保护缺乏竞争力的部门。这些机构如今都在暗示需要产业计划，却不明说。我们要补充的是，这种计划应当是民主的，并为公共利益服务。我们必须建设人民权力和国家能力，约束资本，并在资本拒绝实现社会目标时予以惩罚。

在关于产业政策的旧有论证中，存在一种发人深省的不对称。当富国为半导体、电动汽车、国防工业或绿色技术提供补贴时，这被包装为“创新”或“国家安全”。而当穷国试图加工自己的矿产或保护幼稚产业时，它们就被警告会造成“扭曲”“低效”“腐败”和“财政风险”。事实是，世界市场早已被强国、跨国公司、专利制度、金融机构和军事优先事项所计划。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计划？为谁的利益？在价值链的哪个层级？



《日惹的塞卡滕节》，哈吉·维达雅（印度尼西亚）作于1983 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强调**国家必须进行协调，使贸易政策、能源政策、教育与研究政策、环境政策以及外国投资规则朝着同一方向迈进。缺乏协调，一国政府可能一边宣布要发展本地加工，一边中央银行却让工业得不到长期信贷，电力系统让工厂停电，贸易制度反而奖励进口。贸发会议的论证不无道理，却对“屋中之象”视而不见：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而非公共利益。

不约束资本、不引导资本服务于社会福祉的产业政策必然失败。对于私营部门不感兴趣的社会必需领域，必须由公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与其把公共资金用于私人投机，远不如用公共资金支持公共机构，由这些机构创建受管理的市场、孵化新技术、发展对社会有益的生产线。归根结底，各国若不恢复一定的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产业政策就无法持续。没有这些措施，政府将面临严重的外汇短缺和沉重

的财政代价。久而久之，这些压力会削弱公共财政，破坏工业发展。

全球南方产业政策遭到破坏的部分原因，是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签订。它压缩了各国曾经用于模仿、改编和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创新的政策空间。TRIPS协议使各国更难以按自己的条件建设新技术。全球南方国家是时候重新考虑对知识产权的全面承认。强制许可制度已经允许在公共需求紧急时生产救命药物，类似的工具应当推广到产业发展的其他关键部门。这将改善获取关键技术的途径，加强国内生产，并减少对跨国公司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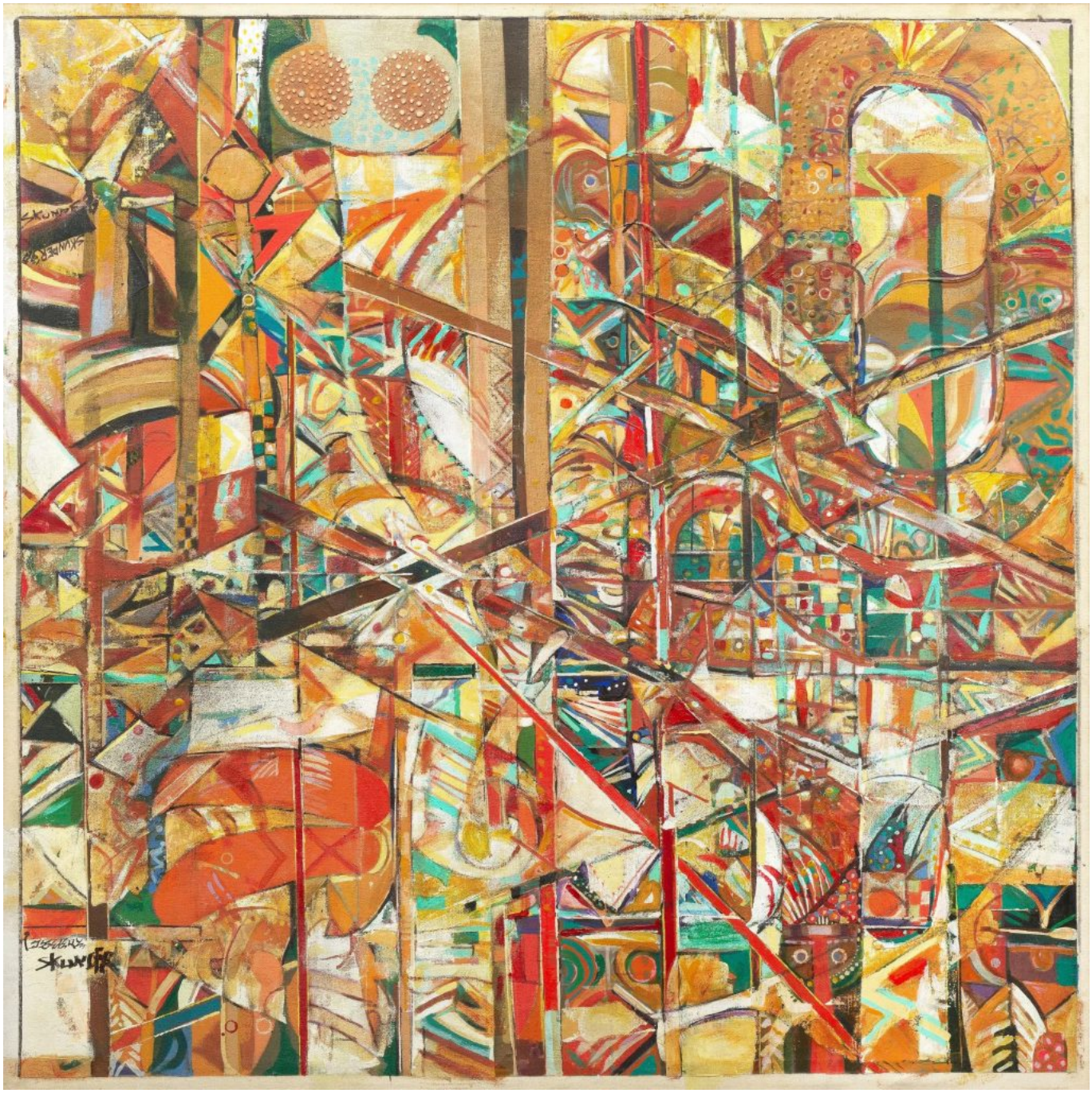
《五月幻想飞行》，格雷沙姆·塔皮瓦·尼奥德（津巴布韦）作于2019 年。

津巴布韦的锂矿政策是当代产业政策所需经济想象力的一个重要范例。2022年12月，津巴布韦《第213号法定文书》（Statutory Instrument 213）**禁止**未经部长许可出口含锂矿石和未精炼锂。这一政策推翻了“非洲国家的角色就是开采、运走资源”的殖民常识。该国利用对战略资源的控制迫使矿业公司投资加工环节，在国内创造更多附加值、技能和税收。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告诫不要采取的那类措施。但当现有制度让采掘显得“高效”、让工业化显得“低效”时，这种大胆的做法或许正是必要的。津巴布韦的禁令改变了矿业资本面对的算计：获取矿石日益需要投资国内加工。这推动企业将锂

矿石加工为精矿，最近又推动其规划硫酸锂设施，使津巴布韦距离电池投入品更近了一步。

津巴布韦的政策应当得到捍卫，但不应被浪漫化。把矿石加工为精矿并不等于控制电池价值链。外国公司仍然主导生产，跨国公司仍然掌握技术、金融和市场准入。当地社区对工作条件、土地、水权以及监管不力提出了关切。出口禁令本身不能培养出工程师、可靠的电力、公有的研究机构或本国制造商。因此，津巴布韦的下一步必须更深入、更具公共性，需要开展一项从矿山到制造的全面计划，联结地质知识、国家股权、开发银行信贷、职业教育、化工加工、零部件生产、回收利用和区域需求。这样的计划需要赋予采矿社区和工人以制度性权力，并确保公共收入用于建设普遍公益，而非私人财富。

津巴布韦的成功不应以加工厂来衡量，而应看锂矿政策是否有助于建设新的公立学校、医院、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电网以及其他公共品。



《十字路口》，亚历山大·“斯昆德”·博戈西安（埃塞俄比亚），1992－1997 年。

联合国第四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2026－2035 年）**凸显了**我们当下时局的紧迫性。每年有近1,200万非洲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则提供了建设区域价值链所需的规模。联合国正确地呼吁非洲从原材料出口转向生产增值商品。但光有宣言和“可融资项目”是不够的。正如格里夫·切尔瓦（Grieve Chelwa）和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绞死非洲》**（How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rangles Africa，2026年）一书中所主张的，非洲需要公共开发银行、大陆基础设施规划、协调一致的矿产政策、原产地规则、幼稚产业保护，同时减轻外债负担，因为外债恰恰抽干了工业化所需的财政能力。

反对产业政策的人并不提供中立的替代方案。把投资交给跨国公司，就是接受一份别处写就的计划：有矿山而无工业，有农场而无食品加工，有城市而无体面工作，还有一场绿色转型，其技术由北方利用在南方开采的矿产设计而成。产业政策并不能保证解放，但它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场域，围绕谁控制投资、生产和经济剩余而展开。全球南方人民有权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建设未来。

当前时局为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打开了空间，部分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长期的停滞使旧处方日益站不住脚。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被污名化、国家能力被削弱之后，全球南方国家必须敢于想象比强加给它们的交易更好的场景。津巴布韦有一句古老的绍纳谚语，值得记住：Chawawana batisisa mudzimu haupi kaviri，意思是“找到的东西要紧握不放，老祖宗不会给第二次。”

热忱的，

Vijay